開國大典緣何提前舉行

劉開生

文史叢譚

眾所周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大喜日子。可是，原定開國大典的日子卻不是這一天，而是一九五〇年元旦。

這樣的安排是基於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考慮的。當時，剛剛解放的北京（時稱北平）社會治安十分複雜，國民黨殘留下來二萬多特務分子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駐北平的國民黨憲兵第十九團也分散潛伏下來，各種破壞活動頻仍。不僅如此，當時我國西南、華南還有不少地方仍被國民黨軍隊佔領，制空權更是完全掌控在國民黨空軍手中。逃亡廣州的國民黨政府不甘失敗，經常派飛機轟炸北平、上海等地。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國民黨空軍六架重型轟炸機還瘋狂轟炸了北平郊區的南苑機場。不安全因素如此之多，如若舉行開國大典，敵人勢必前來破壞。

鑒於上述情況，中共中央決定開國大典緩行，抓緊時間，打擊國民黨殘留人員的破壞活動，解放西南、華南仍被國民黨軍隊佔領的地方，努力營造全國良好的治安環境，並將開國大典舉行的時間初步定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

可是，就在此時，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爲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對蘇聯進行了秘密訪問。訪蘇期間，斯大林曾問劉少奇，你們打算什麼時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劉少奇根據出國前中共中央醞釀的意見如實告訴斯大林：我們目前正集中力量解決華南各省的問題，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一月，具體時間很可能安排在元旦。斯大林聽後建議道：解決重大問題時固然要穩妥，要掌握時機，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錯過時機。我想提醒你們注意防止敵人可能利用所謂無政府狀態進行干涉。這是極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

劉少奇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善意且非常重要的忠告。於是，就及時向中共中央作了彙報。中共中央在認眞考慮斯大林建議並認眞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後，很快作出決定：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同時，舉行盛大典禮即開國大典。之後，又對開國大典的安全保衛工作向有關部門做了周到、細緻、嚴密的部署安排。

福州的《詩之葉》

許定銘

讀書會

我珍藏的一冊《詩之葉》（十六點五乘十二點五厘米）也是「橫式豎排」本。此刊非常罕見，資料僅見於徐瑞岳的《中國現代文學辭典》（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說：

雙月刊。一九三五年六月創刊於福州。福州詩之葉社編輯出版。……今僅見第二期一種，另有《詩之葉》第三期目錄，該刊終刊年月不詳。（頁一〇八七）

我的這冊《詩之葉》剛好是他所提的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版，僅二十六頁。若以雙月刊計算，是如期出版。不過，當年的詩刊經常因財力不繼而隨時夭折，說不定也可能是終刊號。福州詩之葉社亦未見有人提及，只知道社址在福州東大路，代售此刊的是上海的群衆雜誌公司。全書刊甘運衡、方瑋德、周白鴻、宋琴心、陳揖旗、陳學英……等人詩創作十八首，最值得一記的是方瑋德的《十四行》，其時方已故，註明爲「遺作」。譯日本的詩兩首，還有宋衡心的《未來派詩人鷗外鷗》。

一九三五年鷗外鷗出道未幾，宋衡心即已注意到他，《未來派詩人鷗外鷗》文跨五頁，分上下篇，上篇《隨便談談》，談的是一九三三年的中國詩壇，褒「意像（象）派」詩人徐遲、戴伽；下篇《言歸正傳》，說鷗外鷗的詩「都以科學爲歸。是暴動與機械力的讚美者。……未來派詩的表現方式，恰如立體派」。

我在中南海同聲傳譯電影

李景賢

往事鈎沉

一九六三年秋至一九六七年春，我在中國外交部翻譯處俄文組工作。這期間，在中南海時不時地爲中央領導人放映一些蘇聯原版「內部參考片」，有《雁南飛》、《第四十一個》、《一個人的遭遇》等。鄧小平、彭眞、陳毅等人常往觀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沒有到場看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俄語組、外交部翻譯處俄文組以及其他一些涉外單位，輪流派出俄語翻譯進行同聲傳譯。

赫魯曉夫入主克里姆林宮之後，在蘇聯電影中逐漸出現一個「解凍期」，產生了一批宣傳「普遍人性」的故事片。我國最高層某些人對這些片子很反感，斥之爲「修正主義貨色」，但讓在內部放給領導人看，作爲「反面教材」供批判用。

中南海中央外事辦公室的一個會議室，臨時被當作放映廳。這個會議室不算大，也就四五十平米，在前面擺着兩排沙發和茶几，在後面隨便放着四五排椅子，總共可以坐二三十人。放映機是兩部移動式的，顯得比較舊，片子放起來嘎拉嘎拉響，音響效果不怎麼好。每次放映時，廳裡都坐滿了人，不少人還「買」了「站票」。

記得有位高翻叫李越然的，是國務院外國專家局的俄語幹部。他翻得特棒，每句對白都不落下，而且翻得繪聲繪色。有一次，畫面上出現一對青年男女坐在公園的椅子上相偎耳語，他當場竟然也「整」出好幾句「對白」來，逗得「中辦」主任楊尚昆捧腹大笑，打趣地說：「好嘛，小李子，你這個高翻的本事好大喲！連人家小年青搞對象說的悄悄話，你都能聽得出來，而且還聽得那麼眞！要得！」

現場翻譯俄語電影特別難，對白的速度往往很快，譯者一下子反應不過來，而且有些對白還聽不清、聽不眞、聽不懂。說實在的，翻原版電影是件苦差事，除李越然外，很少有人能翻得棒的，所以，同聲傳譯電影，每次都是硬攤任務，幾乎人人都不樂意翻，主要是感到自己的聽力不行。有一次，我向李越然請教提高俄語聽力的辦法。他倒是沒有介紹什麼經驗，只是不好意思地說：「當年我學俄語，有個挺賴的辦法。」那還是在上一世紀的四十年代，在哈爾濱的公園裡，每當夜幕降臨，當時還只有十幾歲的這位未來高翻，常常躲在椅子的後面，「偷聽」白俄老頭、老太太聊天。他說，現在條件不同了，你們年輕人學俄語用不着像我當年那樣「賴」。還說，現場多練練翻譯俄語電影，這是提高聽力的最好辦法。

李越然多次鼓勵膽小的我「大膽」上，說一開始不要怕憋，翻它個十場八場，憋出幾身冷汗來就好了。他還具體教了我幾「招」。譬如，要全神貫注，抓住影片對白的邏輯重點，不求一詞一語的得失，以免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又如，對聽不清、聽不眞、甚至聽不懂的對白，不能愣在那裡傻呆着，而是要根據畫面的情景和對白的上文，立刻作出合理的邏輯推斷，「大膽」地「整」出幾句「對白」來給觀衆聽。

一回生　二回熟

在這位高翻的鼓勵下，我只好「趕鴨子上架」。第一次翻譯的電影是《雁南飛》。彭眞、楊尚昆、廖承志等人在場觀看。這部片子我曾看過，內容是懂的，但由於中央領導人在場，神經中樞也就自動被撥到「緊張」檔上，腦袋直發木，渾身一陣陣冒冷汗。電影一翻完，李越然就給我打氣：「不錯，挺不錯！一回生，兩回熟嘛，多翻幾次就好啦！」後來，我把蘇聯原版參考片的腳本都找了出來，一一細細地反覆讀，還看了蘇聯影評人寫的一些文章。有幾次，外單位的翻譯託詞不願翻時，李越然要我「大膽上」的囑咐，還有他教我的那幾「招」，無形中產生一種力量，「推」着我上去翻。鄧小平、陳毅等領導人都聽過我翻蘇聯原版電影，看後有時對我說了一些鼓勵性的話。電影每次放映完後，對片子本身，我沒有聽到領導人發表過什麼議論。同一部片子，因爲領導人在不同時間要看，放映多遍的情況時有發生。第一次翻譯起來比較難，以後再翻，就一次比一次順當。

毛澤東愛看傳記片

二十多年之後，李越然有一次到蘇聯訪問，當時，我正好在駐蘇聯使館任政務參贊，使館領導讓我全程陪同。一次晚餐後，我回憶起當年翻譯俄語電影的情景，很感謝他對我這個「後學」的鼓勵和具體指點。這位前輩說，你現在有體會了吧，現場練習翻譯電影，這是提高俄語聽力的一個好辦法。他還說，其實給領導人翻譯俄語電影，在我國已經有好幾十年歷史了。接着，這位前輩向我講了以下一些往事：

還在延安時期，師哲就給毛澤東翻譯過《列寧在十月》等片子。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〇年初，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訪問蘇聯時，因爲逗留的時間很長，有三個多月，空閒的時間不少，他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維哈」國賓別墅，調看了蘇聯電影庫裡幾乎全部傳記片，寫彼得大帝的，寫拿破侖的，寫打敗拿破侖的俄軍統帥庫圖佐夫的……毛澤東最喜歡政治、軍事題材的傳記巨片，看了許多許多，而且看得津津有味的，常與隨行人員談論影片中的情節，有時還拿別人開玩笑。有一次，在賓館用餐時，他吃着吃着，突然用手指着坐在斜對面的我方一名警衛說：「我看，他有點像拿破侖！」當時，電影由隨行的俄語譯員師哲同聲傳譯，當時正在莫斯科的周恩來養女孫維世也常去幫忙。

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李越然還給我講了給蘇聯領導人翻譯中國電影的一段趣聞。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兼外長曾爲各國代表團舉行了一次電影招待會，放映大型彩色舞台記錄片《梁山伯與祝英台》。當時，蘇聯代表團團長、外長莫洛托夫因有事而未能看成。周恩來決定爲他放個專場，事前特意交代：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唱詞、對白要安排一男一女同聲對譯；在用俄語寫的電影簡介上，在梁山伯、祝英台兩個名字之後，要加個註明：「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那天，莫洛托夫外長興致頗高，一到周恩來的住處就高聲大喊：「周恩來同志，我現在『討債』來啦！」

電影放映時，由高翻方祖安與歐陽菲作爲「男女搭擋」，爲梁祝的唱詞、對白用俄語「配音」，放映的視聽效果都很好。莫洛托夫看後高興地對周恩來說，從前只知道你們中國人談情說愛的方式與我們歐洲人不同，今天看了這部片子才曉得，你們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談得是如此神秘，結果又是那樣神奇（指梁祝最後「化蝶」）！

這位前輩曾在許多重要場合給毛澤東當過翻譯。他深情地向我回憶起毛澤東對他本人的關懷，對外事翻譯工作者的尊重與信任。一個個例子使我深深感到，外事翻譯的責任眞重，又眞光榮！

中庸之道看宗教

方潤華

如是我見

在當今文明世界，思想自由，各派宗教百花齊放，雖然良莠不齊，但撇開少部分邪教，那些信衆遍天下的各大宗教流派均是導人向善，頌揚和平，大家信奉拜膜不同的聖主，但內心都是祈求幸福平安，面對無法開解之困苦逆境，不失爲一種精神良藥。許多人有了信仰後，滿懷熱誠，以悲憫濟世之心，努力服務人群，對社會對國家均有莫大裨益。

可惜世事總是未能盡如人意。當人們對宗教過分迷信，強調自己的信仰是至高無上，脫離現實環境，於是引致思想分歧，爭辯紛起，最終令各宗教觀點各異甚至相左，此時已是事與願違，與信仰之宗旨背道而馳了。

以我們較爲熟悉的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及儒家思想等爲例，它們各自對世界有不同的描述，崇尚不同的人生觀及道德標準，有的樂觀進取（如興教辦學、贈醫施藥、扶貧濟困等），有的逍遙避世，對功名利祿亦持不同態度，各教派孰勝孰優，難以言盡，如以持衡公平的心態，你會發現既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缺。借喻蘇東坡名詩，眞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故而諸位有信仰人士應放開胸襟，放遠目光，摒棄執著，不偏不倚，以謙和之心容納異見，博採衆長，此乃最佳之「中庸之道」。

以個人來說，有了宗教信仰不等於喪失獨立思考，一切都依賴聖主的保佑，應保持「自助、人助、天助」精神。人生在世，或富貴或赤貧，或長壽或早夭，或悲或喜互相交集，構成甜酸苦辣的人生歷程，有人說「命運天註定」，其實未必盡然，例如吾之長輩、著名實業家何耀光先生，中年時看相被批命壽元不逾六十歲，但他不認命不氣餒，天天游泳及鍛煉，持之以恆的良好生活習慣，令他得享近百歲高壽，成爲扭轉命運乾坤之佳話，這種面對命運決不放棄的進取心，亦可謂另一種積極應變的「中庸之道」。

中庸絕非是得過且過、無能庸碌之俗意。古語有云：「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見，「中庸之道」高如天，厚如地，知易行難，既需要博大心胸與廣闊遠見，亦要有廣博學識與高深智慧，方能明辨是非，分清中間正道還是左右極端，掌握得度，恰到好處。由治理國家平定天下到待人接物立身處世，均少不得一條「中庸之道」。

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之發展，世界大同的時代已經到來，此時此刻中庸之道更爲可貴。在我們的地球村中，人與人的相處，國與國的交往，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共存，不同政見者的意見分歧，如都能持中庸之道，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各取所長，各棄所短，必能多一份祥和，少一份戾氣，和平將眞正降臨世上，幸福會常伴人間！

廣西樂業縣大石圍天坑　李　晉攝

探尋世界第一大「天坑」群

夏威

天南地北

世界第一大「天坑」群——廣西樂業縣大石圍天坑，絕對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地方。從廣西首府南寧市出發，大約經過五個小時的車程，就到了廣西海拔最高的縣城——廣西樂業縣。大石圍天坑位於廣西樂業縣的同樂鎮刷把村百岩腳屯，距縣城十四公里，需二十分鐘車程。

在樂業縣二十平方公里範圍內，已發現了二十八個天坑，其天坑數量和天坑分布密度世界絕無僅有。其中，在全世界十三個超大型天坑中，分布在樂業的就有七個，因此樂業縣被譽爲「世界天坑之都」、「世界天坑博物館」。目前已正式批准爲「國際岩溶與洞穴探險科考基地」、「國家森林公園」、「國家地質公園」和「中國青少年科學考察探險基地」。

據探測，樂業大石圍天坑周圍山峰海拔高度在一千四百四十米以上，洞口東西走向五百五十米，寬三百八十米，深約六百米。

身爲樂業縣文化館員工的李晉，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下大石圍天坑一探究竟的想法。李晉後來牽頭成立了樂業縣「飛貓」探險隊，自一九九九年之後，已經十多次探險大石圍天坑。他也因此成了「飛貓」探險隊的隊長，當年考察隊用了近十七個小時，才下到天坑底部。

當李晉下到天坑底部才發現，這裡並非如原先設想的那樣天堂般美麗。大石圍坑底原始森林密布，植物茂盛，多長於不穩定的碎石上，因此在坑底部行走的每一步，都充滿危險。暗藏殺機。

「在坑底的地下暗河旁，沒有我想像中鬆軟的沙灘，到處是大大小小的石頭，也沒有森林。」李晉說道。但地下暗河，仍然令人神往。在大石圍天坑底部有兩條暗河，河水一冷一熱，又名鴛鴦河。兩條河流在天坑底部相交匯。八年前中英聯合探險隊曾走完了暗河的全程，發現暗河交匯後一直向東北流到位於樂業境內的百朗大峽谷的洞口成爲地面河，然後匯入中國南方最大的水系珠江的上游紅水河。

在天坑底部，灌木叢生，原始森林裡青苔遍布，霧氣裡似明非明，宛若地宮仙境。經初步考察，目前已發現大石圍天坑底部有與恐龍時代生長的國家一級保護植物——桫欏；地面上的蕨類植物長得很茂盛，有的葉片比人還高大。據樂業縣林業科技人員介紹，許多植物群類是現在教科書上沒有的。

曾參與考察的植物學家發現，大石圍底部原始森林內的植物種類多達上千種，大部分迥異於天坑外的植物。此外，大石圍原始森林裡還有冷杉、血淚藤樹等珍貴植物，還有許多中藥材和高大的喬木，其中最大的一棵酸棗樹樹幹需三人合抱。

在地下河，人們發現了盲魚和一些蝦、蟹。暗河中的盲魚形似鯰魚。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張春元說，因暗河裡無光，魚的眼睛逐漸退化而成爲盲魚。坑內還發現了被當地人稱爲「飛貓」的動物和一些鳥類，「飛貓」形似蝙蝠，個頭與貓差不多，前後肢有薄膜相連，展開後可以滑翔。

天坑是一種分布在喀斯特地區的特殊地質景觀，因地下溶洞的頂部多次坍塌裸露出地面而成。一般的天坑都是單獨的一座，樂業天坑卻成群出現。至於樂業天坑群的形成時間，據專家推測，它們大約形成於三百至四百萬年前的新生代第四紀。

文化厚重的「全聚德」老牌匾

李北陵

飲食男女

中國人，少有不知「全聚德」的。當這個以傳統掛爐烤鴨而聞名世界的百年老店迎來一百四十五周年華誕之際，那塊飽經滄桑的「全聚德」金字老牌匾重新高懸於門前。

「全聚德」老牌匾，有頗不一般的文化含量。傳說，這塊金字匾額早於清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就在人聲鼎沸的前門大街喜慶高懸。直到「文革」，全聚德老匾被紅衛兵當「四舊」摘下。一九八〇年，「全聚德」重新恢復老字號名稱，全聚德的人意欲尋回這塊老牌匾。幸而「全聚德」中有人當年在「紅衛兵『破四舊』成果展」上看到過這塊老牌匾，這才終於輾轉從故宮博物院找回離家多年的老匾，收藏於全聚德展館。「全聚德」老牌匾失而復得的經歷，本身就是一種傳奇。

「全聚德」老牌匾，見證了百年老店滄桑巨變。全聚德的烤鴨，源於宮廷御膳掛爐烤鴨，從選鴨、填餵、宰殺到燒烤都一絲不苟。烤出的鴨子不但外形美觀，豐盈飽滿，顏色鮮艷，色呈棗紅，而且皮脆肉嫩，鮮美酥香，肥而不膩，瘦而不柴，素有「京師美饌，莫妙於鴨」的美譽。一百多年來，全聚德菜品不斷創新發展，形成了以獨具特色的全聚德烤鴨爲龍頭，集「全鴨席」和四百多道特色菜品於一體的全聚德菜系，備受世界各國元首、政府官員、社會各界人士及國內外遊客喜愛，有「中華第一吃」之譽。周恩來曾多次把全聚德「全鴨席」選爲國宴，甚至親爲全聚德烤鴨作精闢詮釋：「全而無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從一家小雞鴨舖，到如今擁有八十一家國內外直營、連鎖企業的餐飲集團；從一個小本買賣，到如今全國餐飲老字號第一家上市公司，這塊老匾額的無形資產價值已經超過了一百一十億元。

「全聚德」老牌匾，背後有頗多傳奇故事。據說，全聚德的創始人楊全仁，初到北京時在前門外肉市街做生雞鴨買賣。他每天去肉市上擺攤，都要經過一間名叫「德聚全」的乾果舖。這間舖子招牌雖然醒目，但生意卻江河日下，到同治三年，生意更是一蹶不振。精明的楊全仁抓住機會，拿出多年積蓄買下這家店舖，並請來風水先生命名。風水先生圍着店舖轉了兩圈，突然站定，捻着鬍子說：「啊呀，這眞是一塊風水寶地啊！您看這店舖兩邊的兩條小胡同，就像兩根轎竿兒，將來蓋起一座樓房，便如同一頂八抬大轎，前程不可限量！」接着眼珠一轉道：「不過，以前這間店舖甚爲倒運，晦氣難除。除非將其『德聚全』的舊字號倒過來，即稱『全聚德』，方可沖其霉運，踏上坦途。」風水先生一席話，說得楊全仁眉開眼笑。「全聚德」的名定下後，楊老闆請來一位叫錢子龍的秀才，書寫了「全聚德」三個渾厚醒目的大字，製成金字匾額掛在門楣之上。

金字匾額一掛就是一百多年。可是細心的人注意到：全聚德牌匾上的「德」字中間少了一橫。爲什麼會少了那一橫？有傳說是楊老闆當年請來錢子龍，兩人開懷對飲。不料錢秀才多喝了兩杯，酒後提筆有些精神恍惚，書寫牌匾時不留心少寫了一橫。另一傳說是，「德」字共有十五筆畫，而全聚德開業之初僱了十三個夥計，加上楊老闆只有十四個人。楊老闆刻意叫錢秀才在寫牌匾時少寫那一橫，以表示十四人同心同德。但專家考證卻說，這是沒有根據的傳說。眞正的原因，在中國古代，「德」字本來就是一個多寫字——可以有一橫，也可以沒有一橫。

譬如，至今立於北京國子監孔廟的清朝康熙皇帝御書《大學碑》中的「德」字，就沒有一橫；與全聚德創立同期的清代畫家鄭板橋書寫的「德」字，也是有的有一橫，有的沒有那一橫。

「全聚德」迎來一百四十五周年華誕、宣布第一點四八億隻烤鴨出爐之際，人們看到的不僅是百年老店的老牆老舖老景，更是「全聚德」完美統一的品牌價值與文化品位。